

釣魚島歸屬論證（兩題）

施存龍*

明代澳門、廣州往來琉球航路 見證釣魚島屬於中國

20世紀70年代初發生釣魚島歸屬爭議後，三十年以來，各種媒體報導和專著論文主張由中國人發現、利用、管理的，其時代多數從明代說起、地理多從福州前往琉球航路說起。其實，廣東也有史可證：除了隋唐兩代的潮州外，明代珠江口內外的廣州、上川、澳門等三港與琉球航路也很有關係，很有必要鉤沉。

從琉球與香山縣海港發生關係說起

在由清前期中國主管澳門官員寫的第一部澳門專著《澳門紀略》中，以〈澳藩篇〉逐個介紹明嘉靖時澳門與之有過通航關係的海外各國情況。但講到琉球卻寫得令人遺憾，沒有寫出與澳門港的通航關係，寫的祇是一般的琉球國與明朝中國的關係，最後結語是“今貢道由福建，亦無來粵市者”。作者把眼光限在他生活的清代前中期，而沒有去追溯明代情況⁽¹⁾，使人讀了不得要領，產生疑問：既然過去和現在都沒有與澳門有直接聯繫，又何必寫在“澳葡”裡呢？（而且還有錯話，說甚麼琉球“明時始通中國”，實際，明代以前就有交往了。）

其實，是有直接關係的內容可道的。明嘉靖時，澳門所在縣香山縣人士、學者黃佐在其《廣東通志》中稱：明正統十年（即1445年），“時流求〔施按：明代已稱‘琉球’，這裡仍用隋唐宋及

元初的地名‘流求’，表明明代中期仍有繼用流求為地名；或是黃佐不同意用琉球來作替代。〕使臣蔡璿等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風漂至香山港”。⁽²⁾明萬曆時官任行人〔中央政府辦外交人員中的中級職稱〕的嚴從簡《殊域周諮錄》一書中也有此記錄：“正統八年，遣正使給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劉遜冊封國王尚忠。十年，琉球國陪臣蔡璿等數人以方物貿遷於鄰國，漂至廣東香山港被獲。守備軍官當以海寇，欲盡戮之。巡視海道副使章恪不可，為之辨奏，還其貨而遣之。”⁽³⁾所謂“香山港”，我認為由於是海上漂到大陸沿岸，自然風不可能把船刮吹進小河汊內，所以並非指香山縣城小河港，應指海濱。梁嘉彬先生在〈明史稿佛郎機傳考證〉中認為：“正統間，澳門尚未為人所知，所謂香山港當即浪白耳！”⁽⁴⁾按澳門這個地名在正統時文獻雖未見，但考香山縣海濱，可泊船地點除浪白澳外，尚有十字門和澳門的前身蠔鏡澳，也完全是可能的。兩書記載情節相同，

* 施存龍，原中國國家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學術委員、國家海洋局發展戰略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而使用地名有別，前者稱為“流求”，後者稱為“琉球”。這次琉球的商船雖然是在計劃外由偶然事件即海難事故漂流到香山港，不屬正常通航，但卻從此開創了琉球商船認識琉球至澳包括蠔鏡澳、十字門在內的珠江口間的航路，所以此後琉球商船有時也駛到珠江口內各泊點貿易。

明正德間，葡萄牙人來珠江口內，就是從這裡出發反方向地尋訪琉球國的。東來的葡萄牙人於1511年侵佔明朝中國友好國滿刺加即今麻六甲後，就以其為基地謀進中國，極力搜集有關中國和其鄰邦的情報，其中以原任葡國宮廷藥劑師而派在麻六甲葡督手下任商務秘書的皮列士（或譯皮萊資等）最為積極並有成果。他把搜集到的素材編寫成書，上呈主子，中國早期漢譯為《東方見聞錄》、《東方諸國記》等，新近一本譯稱《東方志：從紅海-中國》。書中“琉球”一節稱：“琉球島（Lqueos），琉球人、高麗人——他們以這兩個名字為人所知。琉球是主要的一個。（……）不斷有三、四艘船在中國和麻六甲做貿易。有時和中國人合夥，有時自己幹。他們在中國福建港 [Foqem，施按：此詞有譯為福州，有譯為漳州，有譯為蠔鏡澳，還有認為是泉州，迄今意見不一。我認為從該書稱由廣州至“水路一天又一夜”及諧音分析，符合蠔鏡澳即澳門；從航路合理講，應首推福州最符合。] 做貿易 [……] 他們製造鍍金櫃子，華麗的的扇子 [……] 他們航行到中國，收購從麻六甲輸往中國的商品，再往日本。”⁽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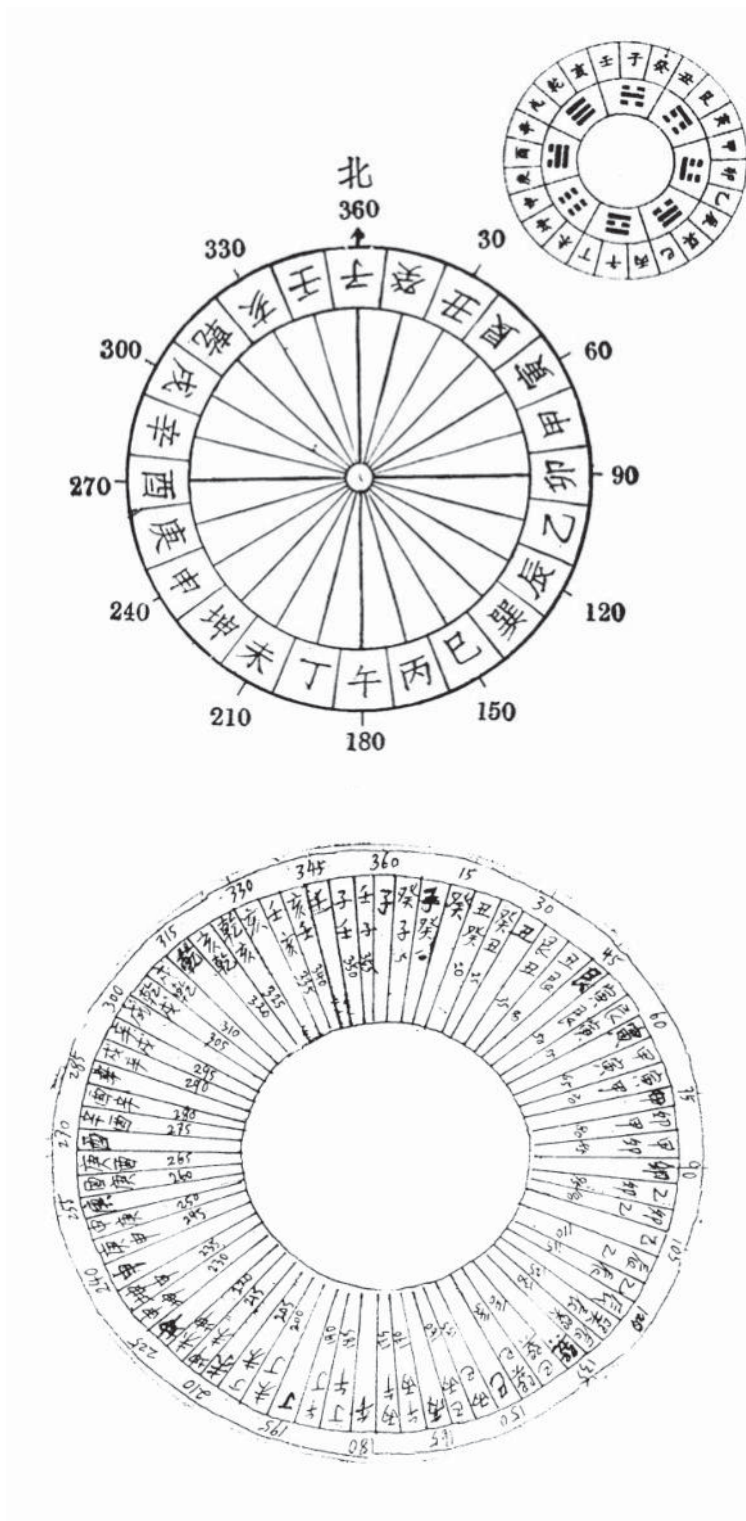
可能由於皮列士這份報告的鼓吹，加上從別的管道獲得琉球的訊息，葡人就嚮往循着中琉航線到琉球去撈好處。1517年，皮列士被任命為葡國來中國大使，由費爾南·安德拉德率領的船隊運送到廣州港的外港南頭 [即西方文獻中所稱的，常見漢譯的“屯門澳”]。他把大使及隨員送到廣州內港後，到廣州城搜集情報後，回到“屯門”，與停泊在那裡的琉球群島等地來的商船船員保持接觸。感到去琉球有利可圖，他便派其中一艘船的船長若熱·德·馬斯卡雷尼亞（Jorge de Mascarenhas）去福建，以便跟中國商船去琉

球。據王順彬等翻譯的張天澤英文本《中葡通商研究》說：“當他到達泉州時，對季節來說，繼續前往琉球群島是太遲了，於是他就留在泉州在那兒與中國人做生意。”⁽⁶⁾ 此譯本中“泉州”，祇是譯者一家之言；還有其它主張，如漳州月港或廈門，或認為是福州。

他那次雖然沒有從珠江口轉福建去成琉球，但後來葡人在浙東雙嶼港被逐、重返珠江口後，在香山縣浪白澳海港至日本航線中還是實現了其琉球之行的願望，並且發展到日本。1542或說1543年，葡人乘坐一艘中國船從暹羅駛往雙嶼港，海上風暴使所乘木帆船脫離計劃航線，被刮到日本與琉球北部接壤的種子島（屬日本九州）。這次偶然海上事件，天助葡人發現了日本，使日後澳門葡人在與日本貿易航線上大獲經濟利益和傳播宗教利益。在1556年6-8月間就有六隻葡船入泊浪白澳，等待次年季風往日本。其間，那個馬斯卡雷尼亞由日本返航前往麻六甲途中，也於12月間停泊浪白澳。據葡文資料記載：“前去日本的耶穌會傳教團於1555年8月至次年6月間在此 [施按：指浪白澳] 停留，準備乘馬斯卡雷尼亞的‘帕利亞’號船前往目的地。”⁽⁷⁾ 無論是中國走私商船往琉球和日本種子島，還是琉球私人商船往來於珠江口琉球間航線，其中絕大多數所走航路往往是要經過臺灣島東北海域中的釣魚嶼外側的，因此他們可以見證釣魚列島的航路作用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可惜迄今我未找到有關記載，希望有條件的學者們予以留意發現，如有所得，請發表文章或素材，以助加強從澳門往琉球航路見證釣魚島歸屬的論據。

嘉靖時“國客”鄭舜功從廣州府城港口起航經琉球而到日本的航行見證

明嘉靖時，倭寇侵犯我國東部沿海越發嚴重之際，“布衣”志士鄭舜功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夏四月到皇宮向嘉靖帝請命：往日本曉諭日本當局控制倭寇侵華，並偵察日本國情和弄



15世紀中國人所用的羅盤。引自韓振華《航海交通貿易》（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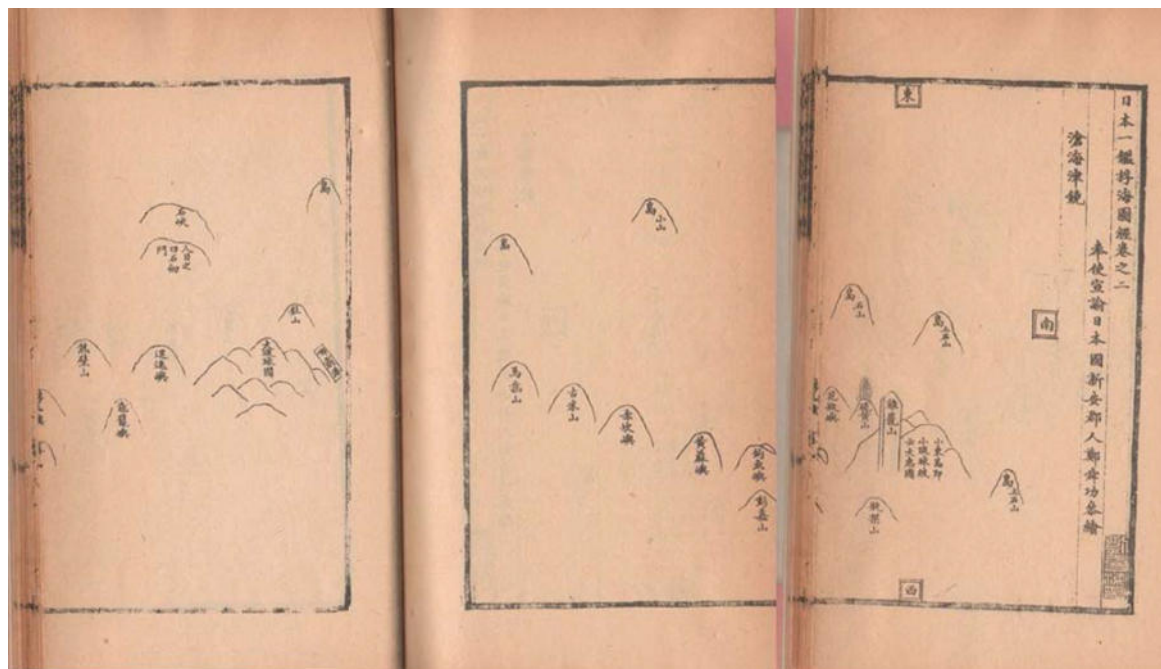
清倭寇猖獗原因及其發源地、根據地，以供國家制訂抗禦倭寇對策作參考；請命被採納後，由當時兵部尚書出任總督南直隸〔相當於今江蘇省和安徽省東部〕、浙江、福建三省軍務的楊宜派鄭舜功往日本。在《明史·日本傳》中祇附有廖廖幾筆：“前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豐後島，島主亦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諸島夷眾，義鎮等實不知。”⁽⁸⁾〈日本傳〉所記有的有錯。豐後國為位於日本九州北部之大友義鎮的領國的地名，而非豐後島島名。但鄭的書中本身也有錯誤認識，如所謂“日本國王源知仁”，其實並非全日本國國王，是明朝對其地方政權首腦的“室町幕府將軍”的誤解；且當時也無源知仁其人，祇有足利義輝。鄭舜功於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動身，是繞道從廣州港起程的。為甚麼從江、浙兩省都有海上近路去日本不走，偏要迂迴走遠路廣東呢？這是為了避開江、浙、閩三省沿海與倭寇遭遇。他乘船出珠江口，向北穿臺灣海峽至臺灣島北，向東拐，船經雞籠山〔今基隆港一帶的基隆山〕、釣魚嶼、……七島嶼至日本的豐後，返回中國也走同一條航路。他說：“與報使清授俱來，遶路溯風，延回大、小琉球國，凡四十晝夜，萬死一生，乃克至廣。”就是說，他與日本派出的使者，名

叫清授的僧人一起，航經即今大琉球國即今琉球群島、小琉球國即今臺灣島，花四十天回抵廣州。他寫的《桴海圖經》中的〈萬里長歌〉有一段詩是講他從廣州起航經歷的：

欽奉宣諭日本國，驅馳領海乘槎出。
 五羊歌鼓浪三洲，先取虎頭出襍頭。
 大鵬飛鳴平海紮，看看碣石定鐵甲。
 靖海東頭馬耳還，大家井里停牛田。
 天道南陽王莽天，詔安走馬心旌節。
 鎮海先須定六鼇，下門平靜金門高。
 永寧東覓烏邱側，有馬行之是準則。⁽⁹⁾

這裡含有一連串古地名，一般是難以瞭解對應的今地名和具體地望的，有必要一一考出註明，個別考不出的也要說明。所謂五羊，是指廣州城由廣東省官方設立在廣州城供接待轉送官員和其他公差的五羊驛站。鄭是從該驛站起程上碼頭。歌鼓浪，是形容船乘風破浪鼓帆前行。三洲，很可能指廣州府同屬的南海縣境高聳的三洲山，也有可能指粵江即今珠江中洲嶼。取，航

海術語，是航海中對着某一目的地駛去之意。虎頭指珠江八個口門之一的航門名，出了此門便見獅子洋、伶仃洋即今珠江口了。襍頭，地當珠江口外，具體不詳。他的船向東北沿海岸航行。大鵬，指今深圳市境的海灣名大鵬灣和海防衛所名大鵬所。平海，指大亞灣以東北的平海所。碣石，指設在今廣東陸豐縣的碣石衛，衛是主管幾個所的高一級海防領導單位駐地。鐵甲，當指甲子門所。靖海，當指惠來縣境的靖海所所在地。馬耳，當指潮陽縣馬耳澳，在今汕頭市南部一個海澳。大家，不解。井里，在今汕頭市境，具體不詳。牛田，當指今汕頭市一個淺海域牛田洋，即解放後被圍海造田的那處地方。詔安，指閩粵兩省邊境上福建一側的縣名和海灣名。走馬，當指該縣境走馬溪，明代葡船曾在此走私不軌，中葡在此發生過小戰役。六鼇，指六鼇所。鎮海，當指鎮海衛，在海澄縣東太武山的鎮海角。下門，指今廈門港。金門，即今金門島。永寧，指永寧衛，設在今泉州市寶蓋山以東南的海隅。烏邱，指烏丘嶼，在興化府莆田縣東南的湄洲嶼以東海中。⁽¹⁰⁾ 有馬，則是指日本的有馬地方。



明代鄭舜功《桴海圖經》經釣魚島示意圖



該詩描述鄭船的行程，從福建烏丘嶼突然跳躍到日本。那麼從福建往日本這一大段空白，要靠福建到日本一段航路的〈萬里長歌〉去銜接。從福建去琉球的啟航點有多處如泉州、福州、金門等等，但往小東島去以後的航路則是相同的。鄭舜功介紹的是前兩個具體起航地，即圍頭和梅花：

一自回頭定小東，前望七島白雲峰。
或自梅花東山麓，雞籠上開釣魚目。
黃麻赤坎古米巔，馬齒琉球遞迤先。
熱壁行行夢家刺，大羅前渡七島峽。
屋久棒津我道中，槎浮影動擊習沖。⁽¹¹⁾

參照鄭的自註，解讀今地理。“回頭”，當指今泉州市晉江縣和南安縣南端部海岸與金門島夾成的圍頭灣，灣口東有一個三面臨海的海角村莊名圍頭，其西側海域即圍頭灣。“定”，指計劃航路定向目標。“小東”，島名，鄭自註是“小東島，島即小琉球”。這裡的“小琉球”，不能理解作今臺灣島西南岸的“琉球嶼”，那是說不通的，必須解作臺灣本島。“七島”，若按向達先生在《順風相送》中解作琉球北部的奄美大島北面的寶島，似不夠確切，按鄭自註“盡山，用正癸針約二更半取七島。此七島者在日本南，為琉球、日本之界”，以解作奄美大島之北的吐噶喇列島裡的七個島嶼為妥。“梅花”，指明代政府設置在閩江口南側的海防單位梅花千戶所，屬長樂縣境。此所名功用隨着明亡已消失，但至今仍留作鄉鎮地名，反映在現福建省分縣圖中。“東山”，即東沙山，也在閩江口。“雞籠”，就是今臺灣島北端的基隆山原名。⁽¹²⁾《明史》中將它代表為臺灣島。“釣魚目”，就是指釣魚島。鄭的自註中也提到“釣魚嶼”：

自所〔施按：指梅花千戶所〕東山外用乙辰針或辰巽針約十更，取小東島之雞籠山。自山，南風用卯乙針、西南風正卯針或正乙針，約十更取釣魚嶼。釣魚嶼，小東小嶼

也。〔……〕盡嶼，南風用正卯針、東風用卯乙縫針，約至四更取黃麻嶼〔施按：指今釣魚島列嶼中黃尾嶼〕。盡黃麻嶼，南風用甲卯縫針、西南風正甲針、東南風正卯針，約至十更取赤坎嶼〔施按：今名赤尾嶼〕。盡嶼，南風用正卯針或寅甲縫針、西南風艮寅縫針、東南風甲卯縫針，約十五更取古米山〔施按：琉球今多稱久米山，在沖繩島西方，為中國與琉球的界山〕。〔該書敘述進入琉球國境後的航路，因不屬本文論證宗旨，從略。〕⁽¹³⁾

他在書中還繪出釣魚島示意圖。文中“乙辰針”、“辰巽針”等均指航海指南針即羅盤上指向的航路方向術語，它是用中國傳統文化上天干地支和八卦來命名方向的。更，是中國古代木帆船航行計時計程單位，請勿與一般的夜間計時的“五更”之類的“更”相混。

上述，“釣魚嶼，小東小嶼也”十分重要，意思是說：釣魚嶼是小東島即臺灣島的附屬小島。這表明至遲在明代前中期，明政府已明確認定釣魚嶼是臺灣島屬島。

該書中引述另一句話說“一自澎湖，次高華，次鼃鼃，次大琉球〔施按：當時對琉球群島稱大琉球〕亦使程也。”我感到原文這段敘述不周到，有問題，應該指出：當時澎湖列島是屬於福建省轄境，把從那裡起航也劃入屬福建啟航點之一，這是可以的，但不說經過小東島，就跳過，說“次高華，次鼃鼃”，而“高華”是隋代從中國去琉球航路上的一個島嶼名，我已在澳門《文化雜誌》上著文⁽¹⁴⁾，後也在大陸內地和國外著文或演講中考定，它就是明代的釣魚嶼；“鼃鼃”是隋代“句鼃嶼”異寫，即是古米島。他不使用明代已改稱的“釣魚嶼”名，卻仍沿用隋代遺名，這就易使後人和不懂航路的人誤解，當作從福建去琉球航路上另一組島嶼地名，並與澎湖島聯繫起來。怪不得有的現代學者把此兩地劃在澎湖列島內，並誤套為花嶼和奎壁嶼。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宣傳來更正這一歷史誤解。



兼論當代中國其它之釣魚島解釋問題

本文旨在探究當今中國學者對釣魚島學術解釋中存在的問題，內容包括五部分：1) 釣魚島是否就是《山海經》中的姑射山，是否即發現於春秋戰國；2) 關於釣魚島統一現用名以何為佳；3) 《明史》中稱釣魚島為“小東之小嶼”了嗎？4) 莫將釣魚島誤解為句鼈嶼；5)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有關釣魚島註釋之是與非。

釣魚島就是《山海經·海內北經》中的列姑射山嗎？

21世紀以來，個別中國研究釣魚島歷史地理的學者提出：《山海經》中所說的列姑射山就是今釣魚島，從而認定中國人最早發現該島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我認為難以成立，為此有必要從根本上考辨清楚。前節是重點，後節是對其他學者主張的述評，是佐證。

一、問題的提出

提出中國人最早發現釣魚島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主張，其依據是《山海經·海內北經》中提到的列姑射山。其文稱：

春秋戰國時代成書的《山海經》，最早留下了中國人發現釣魚臺列嶼的記錄。《山海經·海內北經》記載：“列姑射，在海河州中。”所謂“列姑射”是指無人居住的海山島嶼，按照道家的說法，這種無人島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在海河州中”是指北赤道洋流內的黑潮流帶，按今天的海洋地理學，知道黑潮流帶是海中一個最強大的海流，它的寬度約30海里至60海里，相當於一千條長江那麼大的洪流，這條洪流從臺灣島的東側，宮古八重山群島的西側中間一直流向日本的八丈島。所以，‘列姑射’之中的釣魚嶼、黃尾嶼正好在黑潮流帶的左側，祇有赤尾嶼在流帶中間偏左部位，證明《山海經》所說的‘列姑射，在

海河州中’是指釣魚臺列嶼，是中國先民最具有權威性的確確實實的發現，祇是每一個島山尚無正式名稱。又據《山海經·海內北經》記載，“姑射國在海中，屬燕，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就是指的姑米山“國”。彼時乃是一個小島“國”，在政治關係上屬燕，就像“倭屬燕”一樣。所謂“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就是指“釣魚臺列嶼”各島之“西南”所存在的宮古八重山群島，該群島在海上之分佈確實形成環列之狀。這條“姑射國在海中，屬燕，列姑射西南，山環之”，與前項“列姑射，在海河州中”之記錄，具有很強的互證互補之價值，可以進一步證明，中國先民的東海探索是全海域的，包括了“黑潮”流帶兩邊的海山島嶼，也包括了琉球列島以東的北太平洋內的諸海溝，即《列子》所說的東海之大壑。⁽¹⁵⁾

這一依據立論對不對呢？我以為此說是對《山海經》附會的產物。

二、論《山海經》中列姑射山不可能是今釣魚島

查《山海經·海內北經》原文是：“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射姑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¹⁶⁾

我們先來看古代最早註解經文的學者，晉代的郭璞《山海經傳》是怎麼註解的。他說：列姑射“山名也，山有神人。河州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按這一註文，肯



定是一座山名。但古代也稱海洋中有山形的島嶼為山，如今浙江省海中的舟山，古代還稱翁山。但列姑射是不是就是指海島，還得看整句涵義。他的註釋認為：這座山雖在所謂“海中”，卻是處於河水經過的地方。這“河水”按歷史上習慣是指黃河及其支流的河水；又認為《山海經》所說的“列姑射山，就是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莊子是指東周時哲學兼文學家的莊周，他的著作也被後人稱為《莊子》。這段話出在《莊子·逍遙遊》中。他對“射姑國”未作任何解說。按此言是在肩吾與連叔兩人對話中說的，肩吾向連叔轉述一個名叫接輿的人所說一番言論：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
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
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最後一句是肩吾之評論⁽¹⁷⁾，譯成現代語是：
“在遙遠的姑射山中，有一神人居住。該神人皮膚潔白如冰雪；姿態像處女那樣柔美；不吃五穀，祇要吸清風，飲甘露。乘雲駕龍、在四海之外遨遊。他精神凝聚，能使萬物不受災害而每年糧食豐收。我認為他這些話是狂妄不可信的。”

大家知道，莊子講哲學不像有的人言簡意賅，乾巴巴教條，而是採取講寓言、說故事、編神話、打譬喻來說明問題。他的文學想像力很豐富。對話中三個人都是傳說中人物，或是隱士、仙人，事蹟不可考，所以不能當真。連叔聽了肩吾這番話後，也有一番言論，談到該山的位置：“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四子”，指王倪、齧缺、被衣、許由四個人。有的學者認為是莊子假設的四人。汾水之陽，是今山西省汾河的北面，臨汾，傳說是堯帝的都，實際是大部落酋長的駐紮地，後面還要講到。戰國時另一哲學家列子在《列子·黃帝篇》也有類同的話：“列姑射之山在海河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

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¹⁸⁾兩子的著作中所共同提到的“神人”，其實不是神，而是人。在山西省臨汾市民間長遠傳說中的一位原始社會時的該山女英雄，被後人神化。說山上有神人，本來是古代宗教觀念把人神化的宣傳，不具有歷史科學價值，但現在這裡倒能幫助說明這座山在幾千年前就住着修練氣功養生的人，完全不符合釣魚島一向不宜住人的情況，等於已否認了“列姑射山”乃今釣魚島之說。

在清代木版《山海經》經文中，清代古文註疏家畢沅寫了註釋。他的註釋除了重複郭璞的話以外，強調添加了上述列子的話，聲稱不同意郭註：“沅曰：莊子云：姑射之山在汾水之陽，是在今山西，非此山也，郭註誤引之。”這個註引發我國有二處同名不同地的姑射山。清末光緒二十年成書的郭慶藩著《莊子集釋》，對《莊子》中這段話的註釋反映了中國有兩處不同地點的姑射山：“藐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李楨曰：‘姑射山釋文云在北海中，下文姑射在汾水之陽。考《山海經》本有兩姑射。’”⁽¹⁹⁾而且把這個“北海”當作海域地名。對這一歧義，需要進一步考據分析。

北海，作為地名，後世常指今渤海，當代中國應用擴大，除渤海也包括黃海，如稱“北海艦隊”。但在春秋戰國乃至秦漢，則泛指北方最遠地區（包括大陸地），如《左傳》僖公四年記載：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位居南方的楚國統治者楚子，對位居北方的齊國統治者齊侯通過使者對話，稱對方遠在北方的齊國為“北海”，而稱楚國自己為“南海”。戰國時荀況《荀子·王制》中說“北海有走馬吠犬焉”，指北方荒涼極遠地方的獸類。到秦漢時也用作外國內陸的大湖專有地名，如《漢書·蘇武

傳》記載，匈奴把漢朝派去的使者蘇武流放到遙遠的“北海”去牧放羊群，此“北海”是指今貝加爾湖。以上這些，都與海洋的“北海”毫無關係。

我國古代對該經文作註疏的各學者，認定列姑射是一山名，是共同的。但對它坐落在哪裡解說相反，有的則回避。關鍵是“海河州”在哪裡理解不一：有的祇解說成“在海中”，莫名其妙。有的解說為海、陸各有一處，難圓其說。

我又考一位明代朝鮮人（佚名）學者以《山海經》地名為基礎而繪製出版的中文世界地圖〈天下圖〉中，也有姑射山之名。從該圖所標繪出來的“姑射山”島位置來看，它被置於朝鮮半島的東北方、日本國之正北的海中，它的東側是毛民國，西側是大陸的聃山、肅慎國。我們已知毛民是日本列島古代最北部少數民族。肅慎是中國黑龍江下游的古老漁獵民族和部落“國”，與中國很早就有往來。該地圖上把與釣魚島相鄰的“琉球國”[這裡當指今臺灣島而非琉球群島]標繪在天臺山[當指今浙東天臺山]東南方海中。如此看來，在該學者心目中，這個《山海經》中的姑射山，是在日本國以北的海洋中一個大島⁽²⁰⁾，其地理位置和大面積與中國東南方小小的釣魚島，完全是兩碼事。這也間接否定了“列姑射山”乃今釣魚島之說。

今人袁珂先生在《山海經全譯》一書中把這段經文譯為：“列姑射在海河的洲渚裡——它是由一些海島組成的群島。姑射國在海裡，屬於列姑射，它的西南部有山環繞着。”⁽²¹⁾這樣解譯難以苟同。既說河州在海中，又把這個“海”字理解為今天海洋概念，則與後半句河水所經者自相矛盾，黃河的水怎麼會經過海島呢？所以這裡的海字應作其它意義解讀。另外，他還主張：“《東次二經》有姑射之山、北姑射之山，南姑射之山，即此經所謂列姑射也。此節確當以移《海內東經》始妥。”⁽²²⁾敝見與他正好相反，《東次二經》的話應移並到《海內北經》為妥。因為這個地方處在中國疆域內的北方，而不在東方，還因現在

我們所能看到的《山海經》古本，已非戰國時原本，而是漢代人拼湊的抄本，經文中不免有東拉西扯。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進一步討論列姑射山為今釣魚島依據是否可成立。

第一，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山海經》成書於戰國時，他認為應提早到“春秋戰國”。我看問題不大，不予細究。不過，在他所稱“春秋戰國”時，今臺灣島及其東北稍遠的附屬無名島嶼之一的今釣魚島，對於中原地區的作者尚是陌生的海外之地，是未知之地海島，說那時中國人已探察並認定，並無根據。既無此種客觀需要，更不具備那樣海洋考察的科技水準，人們不能作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臆想。退一步，假定春秋戰國時已有人去探索過，那也應編入《海外東經》內，不會編入《海內北經》和《海內東經》內。

第二，把它當成海洋中島嶼，是對“海……中”兩字的望文生義。對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海”、“四海”、“海內”、“海外”，一定要按歷史地理去理解，決不可按今人海洋地理概念去套用。當時的中國人認為領土四周是由海環繞的，如戰國末期齊國人哲學家騶（鄒）衍（約前305-前240年）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山海經》一書的篇章就是按這種地理觀念編寫的，把國內範圍稱為海內，外國稱為海外。“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即指中國內。“四海”則指狹義或廣義的天下，如“放之四海而皆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並不指今四個海區。

第三，是把毫不相關的兩種事物——內陸山地與“北赤道洋流內的黑潮流帶”按想像生搬硬套在一起，牽強太甚，與釣魚島何關？

第四，不該把經文與今琉球群島南端的古米島拉扯在一起。

第五，把不屬東周戰國時代的國境外東南方的無名小島歸屬為遠離今臺灣的北方諸侯國的燕國行政區域概念中，是完全不可能有的事。釣魚



島是春秋戰國時吳、越國的南部海外之地，怎麼會歸屬到北方燕國呢？彼說完全脫離歷史。

第六，該文祇引了《海內北經》列姑射山，而引未《海內東經》姑射山。按《海內東經》中的《東山二經》尚有有關記載：“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²³⁾這是疏忽。我們分析這些記載顯然是對第二列山脈依次按里程的考察，有陸地有河流的一程地又一程地記錄。第一句走的是陸地，第二句先走的是水上，接看走的是沙漠，如果是航行在海中，會有一百里長的沙漠嗎？不要說中國近海，就是整個地球上也沒有一處。這“水行”，顯然是乘排筏或簡單木船內河航行。第三句走完北姑射山，便又陸行到南姑射山，特別強調了“多水”，如果是在海中，海洋全是水，還用囉嗦“多水”嗎？所以是指內陸中的多溪流、水池、湖沼之類的山區。又按《山海經》的筆法，凡是走水路的里程，必定特別註明“水行”兩字，未註的不言而喻就是陸行。由此也證明是指陸地山而非指山形海島，也就無所謂是釣魚島了。

三、列姑射山可能就是在山西省臨汾市山區

現在我們再來查考這一地名為什麼叫列姑射山之名？它與姑射山和姑射國又是一種甚麼關係？它應落實在何地才合理？

當今山西省地方史地學者在論證該山位置和性質時，卻在無意識中一致否認是釣魚島的說法。我歸納他們的論點為如下幾條：第一，列姑射山與姑射山是同一地方同一種山，與《山海經》成書在同一時代即戰國時《莊子》說的也是同一種山。第二，位於山西省境，呂梁山系內。其北大約始於介休縣靈石，西南達晉陝邊境的河津縣龍門，全山高大陡峻，縱貫晉中、臨汾、運城等市十多縣區，總長數百里，歷為三晉名山，其中襄汾界古城段的姑射山。第三，所謂“海河”是指黃河水溢流進汾河泛聚的地方，形成山水相繞的澤國，所以造成山被水繞似立在洲上的

景觀，像在海中；是古人錯覺的描述。實際上這個洲並非真的在海洋之中。第四、《海內北經》中的列姑射山與嚴重脫落錯簡《海內東經》中所述的姑射山，實際同為一山。

為甚麼叫列姑射山之名？它與姑射山和姑射國又是一種甚麼關係？他們認為：列姑射中的“列”字是標音形聲字，本指排列有序，泛指行列、排列，用於成行列之物，如一系列火車它不是一個車箱，而是由多個車箱組成，所以才稱列，聯繫到列姑射也應是由多座姑射山組成，《海內東經》記載正好佐證了列姑射的座山涵意，故應視《海內東經》和《海內北經》兩經所述一致。同時還應看到綿延數百里的姑射山名，並非一代人所能左右，而是由始名源地點（古城）及其知名度逐步向南北兩地擴展形成的，所以才有所謂成列的姑射山、南北姑射山的稱謂。至於各山所在具體方位，現已難考，但《海內北經》的“列姑射”、《海內東經》的“姑射之山”及莊子的“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指的應都是始名於古城的這段姑射山。要追溯這一地名，首先要從姑射山淵源說起。據山西地方傳說和地名志學者著文稱：

唐堯前，這裡虎狼惡獸成群出沒，晝夜傷害先民，部落首領征招（會）治惡獸能人（……）。住在（後來稱為）姑射山桃花洞的（……）膽大、藝高的鹿女，挺身而出，（……）率領眾民磨石為器、曲木為弓，（……）經過一段時間的圍捕追殺，取得很大成績，少量惡獸（……）竄入深山，為防這些惡獸再返，她派人在峪口晝夜監視守衛，直至惡獸幾絕不再傷害百姓。由於她智高多謀，心地善良，勇鬥惡獸，為民消災，保安一方，功德無量，人們為永久懷念這位巾幗英姿，特將她尊稱為鹿女姑姑（因她喜愛桃花並以此為信物，經常向人間撒佈桃花消災降福，又稱桃花姑姑），並將她居住的山洞起名鹿女洞（即今桃花洞），將石洞所在的山脈起名姑射山，將她開始受命射殺惡獸的地

www.icm.gov.mo/rc



涉及的人、事和典籍較多，粗閱覺得零亂繁雜難以理解，復閱詳讀方顯條理，其引經據典從中闡明了姑射（yè）山的具體在地，詳細敘述了姑射（yè）山名的來龍去脈，我們認為這應當就是所謂姑射（yè）山的來歷。但要說明這個山並非《海內東經》、《海內北經》所說的姑射山，它僅是該山中的一個小支脈，即九孔山（由於九孔相通，又名石孔山）。這個變音易名的姑射（yè）山，不僅用字與姑射山名相同，而且近現代有人把它引伸重複擴展到今襄汾以北的整個姑射山脈，更進一步混淆擾亂了姑射山的公認仿名，顯然姑射（yè）山名的存在和使用，既不符合遠古早已定名的姑射山實情，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亂象，應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綜上所述，可知姑射山是一座古老山脈，其得名始地緣由源於古城，且久經傳承世人共知，完全符合歷史實際。⁽²⁴⁾

2012年9月，我在由美國華盛頓返北京的飛機上，親自詢問一位生在臨汾市、中小學也在那裡上、北京氣象專業學校畢業後仍回山西作氣象工作的技術人員，她說聽過民間射姑和堯王的傳說，也去參觀過那裡與此有關的遺址窑洞和廟。我問當地有沒有把圍繞陸地的濕地稱為“海”的現象，她說有。我問為甚麼？答那裡對一汪水域覺得像海，便那樣稱呼。我考慮我國古代有些內地對一些大池塘、小湖泊稱為“海”的，並不乏其例。隋代在洛陽營造的宮苑人工湖就稱海。金、元、明、清在今北京的城內外的湖泊也稱為海：金代宮苑所在湖泊——西華潭即太液池，稱“北海”。清代頤和園中的昆明湖，原名稱“西海”。積水潭曾稱“海子”。今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駐地稱“中海”和“南海”，合稱“中南海”。當代郭沫若故居和宋慶齡故居所在地湖泊則稱“前什剎海”和“後什剎海”等等，均有地名實指，所以可以理解。為甚麼明明是內陸湖泊卻要稱為海呢？這是由於在北方內陸沒見過

真正海洋的城裡人眼前，湖泊也是“汪洋如海”了。《元史·河渠志》記載：“海子，一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匯於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詠歸錄》中也說：“北人凡水之積者輒目為海。”北京如此，距海更遠的山西省黃河支流的山區，就更不足為奇了。今人不應望文生義，用今日地理學的海洋概念去比擬古地理。

主張《山海經》中所說姑射山是今釣魚島的鞠德源先生是學習並從事檔案工作的學者，我不認識。讀他著述後，我認為他是當代中國民間研究並編寫釣魚島列島歷史資料貢獻最大者。他的成就對推動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竊土和說理鬥爭的作用，功不可沒。1996年，筆者從研究航海史轉入研究海疆史，發現隋代航海家何蠻應是最早發現釣魚島後，寫成文章不敢輕易拿出去，祇敢在內部小範圍試刊。進入新世紀後，圖書館發現在他的著述中，也有一筆提到高華嶼是今釣魚島的話，增加了我的信心。他的論述總體上是對的，但對其所謂戰國時列姑射山是釣魚島之說，我難以苟同。本文純從學術求真出發予以考辨，也考慮到他的說法客觀上會起事與願違的副作用，有所冒昧，請予理解。

關於釣魚島統一現用名稱問題

一千四百多年來釣魚島名稱沿革，隋代時稱高華嶼，歷唐、宋、元幾代承傳，無大的變化。至明代變化大，改為釣魚嶼。現在，臺灣採用釣魚臺，大陸採用釣魚島。我認為都是對的，都可用，但是它的來歷不同，因而在應用上各有不同的側重作用。

明代成書的《順風相送》把前代歷史上的高華嶼、英華嶼改稱為“釣魚嶼”⁽²⁵⁾，我認為這說明閩、浙沿海漁民到高華嶼海域漁業活動更加頻繁和活躍，以致這本原是供海外貿易航海商船使用的航路指南書也採用這一地名。其它中國明代史籍中亦通常稱“釣魚嶼”，如嘉靖三十六年



(1557)的《桴海圖經》，嘉靖四十年(1561)《鄭開陽雜著》，嘉靖四十一年鄭若曾《籌海圖編》，萬曆三十三年(1605)徐必達《乾坤一統海防全圖》等。明後期出現嶼字改山字，如天啟九年(1621)茅元儀《武備志·福建防海圖》稱釣魚山。在中國古代往往把基岩海島稱為“山”，有的一直使用到現在，比如上海的洋山、浙江的舟山和普陀山、福建的大崙山和臺山等，所以稱釣魚山不足為奇。從自然科學分類而言，我是不贊成稱山，易與陸地山混淆。清前期出現官方外交人員將“山”字改“臺”字，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稱釣魚臺⁽²⁶⁾，但個別仍有用“山”的情況。中國明清不同時期，無論怎麼改普通名詞“嶼、山、臺”，而專用名詞“釣魚”幾百年間是一貫相同的。“釣魚臺”這個地名，我認為也並不符合自然科學分類，但我同時認為這個地名很有意思，它更能反映中國文化，因為釣魚臺這一名稱有悠久的歷史，更能表明這個島嶼是中國人命名並傾注中華文化的。中國從南到北的內陸江河邊、海邊多有此地名，如廣東高要縣東高峽山中夾東江流湍急處，安徽廣德縣北二十五里處，山東歷城縣東南黑虎泉前，傳說為距今約近三千年前西周初姜太公封邑齊地後的釣魚處，遼寧省興城縣海濱菊花島附近一處碼頭，遼寧錦西女兒河西岸一處，等等。⁽²⁷⁾我去江蘇調查揚州港，發現大運河淤成的瘦西湖裡，也有一處“釣魚臺”。北京玉淵潭也有“釣魚臺”。特別是中國人把它帶到海外國家去命名航標島嶼，如明代稱越南國靈山與羅灣頭之間的一個島嶼就稱釣魚臺，今地無考。⁽²⁸⁾不過，正是由於這個島嶼叫“釣魚臺”，感到有點蹩扭。但是無論你喜歡不喜歡這個名稱，它是歷史事實存在，尤其在使用清代歷史資料時必須用它。但在與日本交涉現代釣魚島問題時，我以為用“釣魚島”名稱為好，理由是日本人為了竊取這塊中國領土，把它先改稱為“魚釣島”，因此我們就勢改為“釣魚島”。前述提出釣魚島就是《山海經·海內北經》中的列姑射山主張的作者也在使用‘釣魚

臺列嶼’，所以建議海峽兩岸中國人統一使用釣魚島地名。當然，在我看來，最切合實際的名稱是“釣魚嶼”、“釣魚嶼列嶼”，但現在辦不到了。我們以大處着眼，不必計較與大陸使用同名會有矮化另一岸之嫌。

《明史》中稱釣魚島為 “小東之小嶼”了嗎？

2008年日本艦船在我國釣魚島海域以霸佔國身份，蠻橫地故意撞沉臺灣漁船後，6月18日北方網、新浪網、鳳凰網、華商網等紛紛報導，有人引用《明史》說：“釣魚島在明代被稱為小東（臺灣）之小嶼。”我無法知道原話是否如此說的，或報導者走了原意，反正認為這一引證的出處說得不對。查《明史》中講臺灣事的專篇，未見有此話。《明史》〈外國傳〉中，稱今臺灣島為雞籠山，記載內容全為今臺灣：“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²⁹⁾但雞籠山名稱原來祇是臺灣北部一山名。《中國名勝詞典》“基隆嶼”條中附稱：“基隆港以東約10公里，即瑞芳鎮東北4.4公里有基隆山，為一死火山體，高589米，舊亦以自海上望之形似雞籠而得名，並因基隆港改稱而易名基隆山。”明初一般稱今臺灣島為小琉球，明洪武年間，流求中山王阮受冊封後，稱今琉球為“大琉球”，臺灣為“小琉球”。其它場合有稱東番、雞籠、北港、大員、臺窩灣。南明時，永曆十五年，延平郡王鄭成功以熱蘭遮城為安平鎮，故名王城，赤嵌城為承天府，總稱“東都”。永曆十八年，鄭經改東都為“東寧”，罕見其他人有稱“小東島”的。

我研究中日航路時看到，此話出在鄭舜功於明嘉靖時赴日歸來後成書的《日本一鑒》：“取小東島之雞籠山（……）至十更，取釣魚嶼，（……）釣魚嶼，小東之小嶼也。”⁽³⁰⁾以上供有關作者和各通訊社、網站參考。

莫將釣魚島誤解為句鼈嶼

十多年前我讀到一篇講海疆的文章，內稱“句鼈嶼應該就是現在的釣魚島”。又說：“句鼈的字義是似龜的帶雙角的甲蟲。釣魚島的形狀很像一隻海龜，路程計算也差不多，我認為應是指釣魚島。”⁽³¹⁾筆者當年寫釣魚島論文的動因之一，就是為了表明不同意此論斷。這種臆測不但在學術上站不住，而且對外交說理也有危害，正中日本奪島陰謀者的下懷。謹述不能同意理由如下。

第一，句鼈不是帶角的甲蟲。此文未舉說法依據，恐怕來自《說文》。《說文》對“句鼈”解字稱：“（奚鼈）屬，頭有兩角，出遼東。從鼈，句聲。”《說文·鼈部》還另解作蛙屬。⁽³²⁾《說文》中無鼈字。《新唐書·地理志七上》有單講“鼈”：“廣州南海郡……土貢：……荔枝、鼈皮。”鼈屬。⁽³³⁾兩字合併的句鼈，應按下述唐代、清代人解釋。句與句鼈，區別在於：產地不同，前者產於寒冷地區的遼東，後者產於亞熱帶的臺灣、琉球一帶海岸。形狀不同，前者帶角，後者無角。

第二，釣魚島島形並不像龜形。從照片平面看，它像一塊紅薯。從空中俯視山峰尖凸，不似句鼈背。所以，釣魚島不能等於句鼈嶼。

第三，句鼈嶼是今琉球群島中的枯米島。半個多世紀前梁嘉彬先生認為句鼈嶼是今琉球群島中的枯米島的見解是正確的，香港國學專家饒宗頤論文中也認為：“按句鼈嶼為那霸外久米島，於地理當無大誤。”但他未有論證。⁽³⁴⁾我除了支持外，補充理由如下：

其一，認準句鼈是何動物，所取地名與實物相一致。我國古人不會無緣無故取句鼈嶼這樣地名，必與這種動物有關，不是島形相似，就是出產該物。晉代左思《吳都賦》提到此種動物：“句鼈、鯖鱸”。唐代劉良註曰：“龜屬也，如瑇瑁，此與單名句者，並非一物。”“其形如笠，四足，縵胡無指，其甲有黑珠，文采如瑇瑁，可以飾物，血如龜肉，肥美可食。”⁽³⁵⁾原文見《文

選》，當代《辭源》第3187頁有引。清初，首任清朝巡臺御史的黃叔璥，是個有心人，在臺灣工作期間，根據調查研究所得，寫成《臺海使槎錄》。其卷三《物產》中說：“句鼈，龜屬，卵生，狀似，四足漫胡，無指爪，大者百餘斤，小者數十斤。常從海岸赴山凹，佔孔伏卵；人伺其來時，（……）眾並力反其背，則不能動矣。（……）味同牛肉（……）甲可亂瑇瑁，亦以飾物；但薄而色淺，不任作器。（……）劉欣期《交州記》作蚶辟。”⁽³⁶⁾清代人與唐代人認知一致。

其二，所取地名與實物相一致。黃叔璥在該文中還說到：“南路龜壁[施按：原文如此]港以此名，今寫訛。”從黃的生動描述，似本人親見。但黃祇就此物聯想到臺灣南路有一處地名叫龜鼈港按此物取地名，卻不知我國先人對琉球早已有按此物取地名的情況，易招歧義，以致附會在臺灣地區。以此物命名地名並非臺灣地區專利，況且時代相隔千年，地名重複是常見現象。這是在此要特別指出的。從現代日本學者大塚勝久《沖繩宮古·八重山諸島》所附古米島及附屬小島圖看，更像龜形。我國已有學者引述：“據地理特徵來驗證，古米山（米久島）在那霸西方100公里的海上。該島的島形頗似句鼈之狀。又在久米島之東別有東奧武島和西奧武島。按日本、琉球近地島嶼主屬連稱之習慣，稱為久米島奧武。西奧武島之海岸一遇乾潮之時，便顯露出龜背、甲羅狀的菱形火山巖，直徑1.5-2.0米的五角形、六角形的巨石達1000餘塊。又察古米山山地森林之內棲息陸生山龜，其背甲之形狀亦與句鼈之形狀相似。據此可知，隋代所命名的句鼈嶼，必定緣於古米山或奧武島的島形和地形及山龜之形三者之特徵。”⁽³⁷⁾

其三，“再據島嶼名稱之語音用字來驗證，琉語古米山（久米島）皆讀 kumejima，久米島奧武則讀 Kumejima，而漢語句鼈兩字讀作 Goubi，兩者語音相近，而漢字句鼈，既葉（符）其音，又像其形，復表其義，較古米山（久米島）之名又有較深之蘊涵。”⁽³⁸⁾

其四、參考明朝派往琉球或日本的使者航路，句躑嶼不在臺灣而在琉球境。明嘉清十三年（1534），明朝廷派出吏科左給事中陳侃任赴琉球國的使者，他回國後寫了《使琉球錄》，流傳至今。他記航路說：五月“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施按：指乘在中國使船上的琉球人）鼓舞於舟。”⁽³⁹⁾“小琉球”之名，在元代或明初乃指今臺灣島而言，如《明祖訓》所列十五個不征之國，就有之。但到明中期嘉靖年間陳侃時，這裡所說的“小琉球”則是指小琉球頭，即今臺灣島北端的基隆嶼，也並非指鳳山縣的小琉球。平嘉山即今彭佳嶼，黃毛嶼即今黃尾嶼。古米山即姑米山。琉球人見了古米島高興起來，因見到該山說明他們已安返祖國。可見它是琉球西南國界內門戶標誌島嶼。這一航路途中的島嶼排列，與《隋書·陳棱傳》航路中進入流求前沿島嶼對照，正好對上是句躑嶼。

其五，我從清代一首詩中，推論到清代人已認知句躑嶼就是中國人專指琉球境前沿標誌性的島嶼。如丁澎〈送汪舟火檢討奉使冊封琉球〉詩中有：“孤懸躑嶼海涯間，襟帶窮荒控百蠻。”

由於提出這一錯誤主張的作者未見更正，他十年後著文稱：“早在隋代的史料裡已經出現過句魚的地名，說明中國人很早就發現、使用這些島嶼；隋大業三年重（西元607年）力煬帝命虎賁郎將陳棱征討琉球，去琉球必須經過釣魚島。”⁽⁴⁰⁾此說仍不妥，第一，請問“隋代史料裡”何曾“出現過句魚的地名”？這“句魚”兩字，恐是筆誤，實際要表達的乃是句躑。可見未作更正。第二、時間不準，隋大業三年何曾派陳棱去征？這一中國紀年並非筆誤，因括符內註有“（西元607年）”。這裡費了不少筆墨論證，除了減少以訛傳訛的擴散外，更重要是防止日本竊奪者鑽空子。

總之，把釣魚島解讀為《隋書·流求國》中的句躑嶼既錯誤又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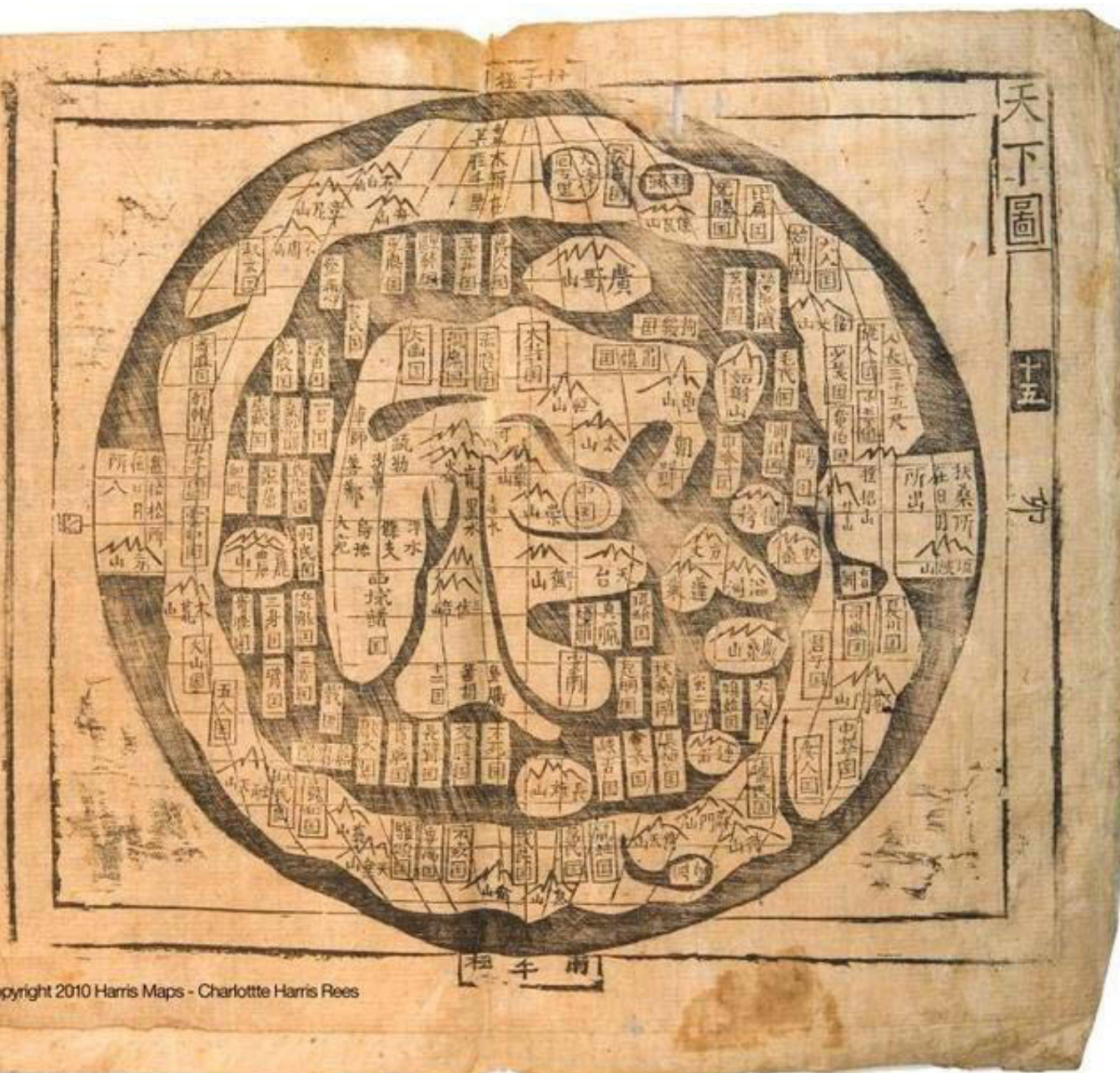
對“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有關釣魚島註釋的探討

我國中華書局組織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對推動和繁榮我國當代和今後中國海外交通史、中外關係史研究和普及具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由於這些史籍年代都較久遠，理解不易，又或歧義，故註釋工作很重要。一些註釋家傾注了不少心血，使讀者既省事又獲益。他們作出的貢獻，功不可沒，但也不免有註釋不中肯乃至錯誤。近年來我在研究我國航海家過往釣魚島之過程中，發現有些至關重要的事項註釋值得商榷。現就其中四種元明著作涉及釣魚島的註釋中間題，探討如下。

一、向達先生註釋的《兩種海道針經》

集歷代航海家航海經驗積累相傳，而於明代前中期成書的航海指南書《順風相送》和清初成書的《指南正法》兩書，由前北京大學老教授向達先生作整理、註釋，合成《兩種海道針經》一書出版。

我發現該書這方面亦有註釋不確。例如：在釣魚嶼條中註釋說：“釣魚嶼在臺灣基隆東北海中，為我國臺灣省附屬島嶼，今名魚釣島，亦名釣魚島。”⁽⁴¹⁾按釣魚島為中國航海家最早發現和命名，在明代史籍中已改稱為釣魚嶼，曾稱釣魚山，清代主流改稱為釣魚臺，至今臺灣仍習稱為釣魚臺。今我國大陸則稱為釣魚島，中國從來不曾稱過魚釣島。“魚釣島”之名，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為了竊取中國領土，名不從主人，故意在地名上埋下玄機，把水攪混，把中國名的固有漢字地名釣魚嶼和釣魚臺前兩字顛倒。19世紀末，日本發動甲午侵華戰爭時，日本內務部核定改為“魚釣島”，後來索興徹底抹去中國原名，利用英國海圖上的地名，轉改稱“凸列島”，又改“尖頭諸島”，乃至“劍閣列島”等，正是我們要力加揭發批判的內容。向先生是愛國者，卻也不知不覺上了日本人的當，客觀上視其為其正



(明) 佚名朝鮮人：〈天下圖〉

轉引自 Hendon M. Harris *The Asiatic Fathers of America*, Warwick House Publishers 2006

常地名之一。我以為不應說“亦名釣魚島”，應該更正為：“今名釣魚島或釣魚臺，日本企圖竊佔時故意名不從主人，顛倒作‘魚釣島’。”

在《順風相送》篇中“福建往琉球”節，提到“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取小琉球”⁽⁴²⁾，“見小琉球雞籠頭山”⁽⁴³⁾。在《指南正法》篇的“東洋山形水勢”條中稱：“琉球仔生開津嶼，有椰樹有番住及郎嬌大山。”⁽⁴⁴⁾向先生註釋說：“小琉球、小琉球頭以及琉球仔，當俱指今臺灣南部西海岸枋寮口外之琉球嶼而言。”⁽⁴⁵⁾這裡對錯參半。所謂臺灣枋寮口外，即今臺灣島西南岸的屏東縣枋寮鄉，其以西海中相望的小嶼即是琉球嶼，所以這條註釋祇有對它的地望才是確切的，而套到從福建前往琉球國那霸港航路上的“小琉球頭”上就不合理、因而不合用了。因為從福州往琉球群島的主島去，是不需要也不應該南航到臺灣島西南海域，然後再迂回北返向臺灣島東北海域駛去，無此種航行法，否則違背航海常識。在福州往琉球航路上祇可能航經臺灣島北部海域，船舶要取準的航標島嶼祇能見基隆港外的小琉球嶼即基隆港的雞籠山，今名基隆嶼。

二、余思黎先生校點的《殊域周諮錄》一書的琉球國篇，較詳細地敘述了該國的國情及與中國交通的關係，其中開頭就認定隋代陳稜率艦隊所征的流求國就是明代交往密切的琉球國，這比近、現代流行的把隋流求國祇視為今臺灣島為確切。它還詳細引述了明代嘉靖十一年出使琉球國的陳侃（kan）《使琉球錄》和嘉靖四十一年出使琉球的郭汝霖《使琉球錄》，其中都有航經釣魚嶼，即今名釣魚島情景。郭錄還將今臺灣和琉球分開為兩國的概念很清楚：“小琉球不通往來，未嘗朝貢”，指今臺灣；“今之封敕為中山王者，乃大琉球國也”，指的是今日本佔有的琉球，這也是對的。但末了卻說“其山曰鼉鼉嶼（國西），曰澎湖島（國西近福興漳泉四郡界……）”⁽⁴⁶⁾這就不確了。按這裡所說的“鼉鼉嶼”，就是《隋書·流求國》中所說的句鼉嶼，它就是陳侃和郭汝霖所

說的琉球國境內的枯米島，說它是琉球國西邊，這是可以的，但怎麼能把它與臺灣的澎湖島放在一起呢？澎湖島是在臺灣島西南海中，不知是嚴從簡本人糊塗了呢，還是轉抄或排版中出的問題，但當今學者不乏這種地理知識，理應校出，但點校者卻未能有所指出，這又是與澎湖列島中奎壁嶼混為一談了。

三、明人黃省曾著《西洋朝貢典錄》中，將今臺灣和琉球的兩地情況混寫在一個“琉球國”內，這是很不妥當的。謝方先生在校註中已指明該書的“琉球國”是把兩地包括在一起的。但對原著中的“鼉鼉島”雖還原為《隋書》中的“句鼉嶼”，但卻解讀為“即今澎湖島之東北角奎壁山”；“高華嶼”解讀為“即花嶼，今澎湖列島中最西之小島。”⁽⁴⁷⁾這就不對了。這一解讀來源於日本侵佔琉球和臺灣期間由日本學者臆度出來的，完全不切實際的張冠李戴。我國有的學者未察覺，納其說而流傳之。過去我沒機會讀到臺灣出的書，費勁去考證。近年方知抗日戰爭後，去臺灣的原大陸學者梁嘉彬先生早已著文批駁。

四、元代汪大淵著《島夷志略》，其中〈琉球〉篇寫的內容卻都是今臺灣的島情。今人蘇繼庠先生對此書琉球篇中“琉球”條註釋稱：“此書之琉球，指今我國臺灣。《隋書》作流求。韓愈〈送鄭尚書序〉，（……）皆作流求。張鷟《朝野僉載》作留仇，劉恂《嶺表錄異》作流虯，（……）似皆由其南部有區域名郎嬌而得音。入明代，流求成為沖繩島之專名，清代因之。（……）沖繩島既有流求之名，於是明清撰述，在追尋沖繩古史時每好引《隋書·流求傳》中語以實之，而不知其適為張冠李戴也。”⁽⁴⁸⁾

我認為在這段釋文中有幾個問題。

1) 是把唐代韓愈〈送鄭尚書序〉等書文中的流求、流虯等原本指臺灣基隆以東北230海里外的流求國當作臺灣，反而指責別人是張冠李戴了。其實，〈送鄭尚書序〉中說：“其海外雜國，若東則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⁴⁹⁾按

耽浮羅，即耽羅，亦即《隋書》中的聃羅，音譯同地異字而已。《隋書·東夷傳》：“上[施按：指隋煬帝]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至竹島，南望聃羅國。”按百濟就在今韓國境，日本學者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解釋今地：“竹島是在全羅南道珍島西南的一個小島，聃羅國就是濟州島”。⁽⁵⁰⁾一句話，就是裴清從今韓國的竹島可以望見的濟州島。毛人，一般認為是與蝦夷為近鄰的民族，也有認為就是蝦夷人，是日本列島北部的原住民，被日本委奴族侵佔、同化。梁嘉彬則認為琉球原始民族矮小、多毛。既然把流求置於兩個北方小國耽浮羅、“毛人”之中間，那麼韓愈心目中，它也當然是北方國家，就表明他認為唐的流求，即隋的流求，處於北方，因而符合今琉球主島位置。把流求與耽羅兩地並列在一起，也說明隋唐的流求主要是指處於北方的琉球。

2) 又說：“《元史·瑠求傳》云：‘近瑠求則謂落漈’，按‘落漈’謂流經臺灣海峽之黑潮，土名‘溝’；‘落漈’謂船隻穿經此黑潮而過，土名‘過溝’。”如此解說不對頭。接近瑠求的“溝”是指中琉深溝，亦稱沖繩海槽，南北長約1,000公里，寬150公里，最深處達2,700多米。船航經該溝，就稱“過溝”。在清朝去琉球國冊封其國王的使者旅行記錄《使琉球錄》中，就有這種過溝的具體記錄。因深海溝處，海浪特別洶湧，船上人要舉行恩威並示的祭神。如清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出使琉球國的汪輯在其《使琉球雜錄》卷五中載：“二十四日（……）酉刻遂過釣魚嶼。（……）二十五日（……）薄暮過郊（或作溝），風濤大作，投生豬羊各一，潑五斗米粥，焚紙船，鳴鈺擊鼓[施按：這是為求過溝平安而舉行的酬海神儀式]”。乾隆二十一年使琉球的周煌《琉球國志略》、嘉慶五年使琉球的李鼎元《使琉球錄》、嘉慶十二年使琉球的齊鯤《續琉球國志略》中，都有這種過溝祭典的記載。而且由此可見，即使在元代，所謂瑠求，也主要指琉球，祇是夾雜進一些臺灣情況。

3) 蘇先生還在註釋同書“澎湖”條中說：“藤田氏云：高華嶼即今花嶼，句鼃嶼即今奎壁嶼。按今澎湖東角有奎壁澳，與此澳相對為奎壁嶼。”⁽⁵¹⁾這“按”字之前，提供了他的根據來源，之後，是他本人的附和，並為藤田作補充。藤田氏是指日本學者藤田豐八。他在日本大正四年即1915年出版的《《島夷志略》校註》一書中，不但論定“隋代流求為臺灣”，而且把句鼃嶼對應為今澎湖列島中的奎壁嶼。此後發生爭論時，便有在日統期間的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幣原坦著文總結稱：“在〈陳稜傳〉裡固然有了‘月餘而至’一句，但他在潮州出發之後，曾在高華嶼、句鼃嶼兩島停泊。”⁽⁵²⁾我敢說，他停泊兩嶼之說並無史料證據，也無事實可能，完全是憑空設想出來的。當然還有清末《澎湖廳志》卷一附和，所謂“奎壁山……原名句鼃，以形似得名”在影響讀者。遺憾的是，當代中國有些學者未加深究，幾十年來一直盲目以他們的註釋來解釋地望，以訛傳訛。花嶼地勢很低，海拔僅12米，北風時，嶼的東西北三面均不可泊船；南風時，風浪特高，四面均不可泊船。莫說一千四百年前的隋代，該島尚處於原始狀態，豈能停泊運載萬餘官兵及有關物資的大量較大木帆船？島嶼上淡水很少，抗日勝利後在島上加挖了井，若駐兵萬餘也祇夠喝兩天；豈能在隋代未挖井情況下供萬餘人喝並用幾十天？（船上雖有自帶水，因在航行前途中要用，總是在靠岸時盡量用陸上水）。

隋之高華嶼，我考應是今釣魚島，不是甚麼澎湖列島中的花嶼。“句鼃嶼”也不應是澎湖列島中的“奎壁嶼”。“澎湖島東北端根本無叫奎壁嶼的名稱，原來祇是馬公島裡一座小山丘名叫‘奎壁山’的錯誤。”⁽⁵³⁾奎壁山下並不能泊大量木帆船。⁽⁵⁴⁾句鼃嶼無疑是琉球群島中的枯米島。限於本文宗旨和篇幅，不能充分展開，好在筆者在其它有關討論釣魚島論文中已有詳考。

以上多有冒昧，倘見不當，請高明賜教。



【註】

- (1) (清)印光任、張汝霖合著《澳門紀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48-49。
- (2) (明)黃佐：《廣東通志》卷七六〈外志〉。
- (3) (明)嚴從簡：《殊域周諮錄》，中華書局1993年，頁130。
- (4) 梁嘉彬：〈明史稿佛郎機傳考證〉，載《明代國際關係》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店1968年，頁33。
- (5) (葡)皮列士著、何高濟譯：《東方志-從紅海-中國》，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 (6) 張天澤著英文、王順彬等譯漢：《中葡通商研究》，華文出版社，2000年。
- (7) 中譯文，轉引自張廷茂：《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澳亞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頁56。
- (8) 《明史 日本傳》。
- (9) (11)(13)(明)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民國二十八年舊鈔本影印。
- (10) (12) 除筆者幾十年間在閩、粵沿海行走實踐外，參考明代地圖、《籌海圖編》、《順風相送》、舊地方誌、民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當代《中國古今地名詞典》、《民用中國航路指南》、海軍航保部民用有關《海圖》、兩省今圖等。不一一分列。
- (14) 拙文：〈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中國航海家發現釣魚島〉，載澳門《文化雜誌》2011年冬季，第81期。
- (15) 鞠德源：《釣魚島大展》，第二章 釣魚臺列嶼發現篇，頁35。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網站。
- (16) 《山海經》，嶽麓書社2006年，按(晉)郭璞《山海經傳》重排本，頁144。
- (17) 載《諸子集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三冊(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卷一，逍遙遊第一，第四頁。
- (18) 載《諸子集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三冊(晉)張湛著：《列子·黃帝》第十四頁。
- (19) 載《諸子集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三冊郭慶藩著《莊子集解內篇逍遙遊》，第十四、十五頁。
- (20) 轉引自 The Asiatic Fathers of America by Hendon M. Harris, Warwick House Publishers 2006。
- (21) (22)(23) 袁珂：《山海經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62；頁260；頁102。
- (24) 臨汾市地方誌辦公室“臨汾通”網站2011-6-29發佈的劉武經、徐磊：《姑射山地望及起名源地——姑射山異化變音易名緣由辨析》。
- (25) 向達校註：(明)佚名《兩種海道針經》，中華書局1961年，甲第96頁。
- (26) 參見臺灣版《全臺文》。
- (27) 臧勵蘇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年，頁862。
- (28) 同前《兩種海道針經》，甲第34頁，乙第118頁。
- (29) 《明史》，中華書局橫排本。
- (30) (明)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嘉靖三十五年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八年影印舊抄本，卷二《萬里長歌》。
- (31) 許森安：〈隋朝陳棧到的地方究竟是琉球還是臺灣〉，載呂一燃主編：《中國海疆歷史與現狀研究》論文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85、89。
- (32) (33) 轉引《漢語大詞典簡編本》[K]，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年，頁2127；頁2128。
- (34) 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大字出版社1996年，頁296。
- (35) 原文見《文選》。引當代《辭源》，頁3187。
- (36) 收錄於《全臺文》，第52冊，臺北：頁79-80。
- (37) (38) 轉引鞠德源：《日本國竊土源流釣魚島主權辨》，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頁630。
- (39) (明)陳侃：《使琉球錄》，臺灣文獻叢刊：明代《使琉球三種》，臺北：
- (40) 許森安：〈關於釣魚島等島嶼主權歸屬的歷史考證〉，載《亞非縱橫》2006年第4期。
- (41) (42) 向達整理註釋：《兩種海道針經》，中華書局1961年版，《順風相送》，頁96。
- (43) 同(27)，頁91。
- (44) (45) 同(27)，《指南正法》，頁128；頁213。
- (46) (明)嚴從簡著：《殊域周諮錄》，中華書局1993年，頁166。
- (47) 謝方：《西洋朝貢典錄校註》，中華書局2000年，頁50-51。
- (48) 蘇繼庠：〈《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頁18-19。
- (49) (唐)《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送鄭尚書序〉。
- (50) (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56。《新唐書·流鬼傳》也有介紹。
- (51) 蘇繼庠：《〈島夷志略〉註釋》，中華書局1981年，頁14。
- (52) 轉引梁嘉彬：《論隋書“流求”與琉球臺灣菲律賓諸島之發現》，載《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北市東海大學1965年版，頁307。
- (53) 同上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231-232。
- (54) 同上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309-310。